

广西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李 露

现实与理想

——广西希望工程评估研究

主 编 陆汉文

副主编 曾昭皓 彭 瑛

广西人民出版社

前 言

在现代社会,一个地区以及一个民族的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均有赖于该地区或该民族科学技术的掌握、运用,其发展最终取决于教育。教育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民族地区发展的趋势。从区域研究的角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给以全面、系统的回顾与总结,为当前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更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为此,广西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组,承担了一些科研项目(香港乐施会项目、广西教育厅项目、广西“十五”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广西大学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院科研项目),深入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作为这些项目的研究成果——“广西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研究”丛书的出版,正好适应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这一迫切需求。

民族教育自身具有独特功能,它兼有民族教育和民族工作的双重属性,对于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重大作用,在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稳定与发展的大局中也占有特殊的地位。为了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实现各民族平等,五十多年来,国家为少数民族制定了优先发展的政策,对于少数民族教育更是给予重点扶持,在资金投入、招生、毕业分配、干部培训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和措施。这些扶持政策使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有了迅速发展。特别是1998年底国务院批转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199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所强调的教育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地位,以及对于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提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等方针政策,都为新世纪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振兴指明了方向。

广西是一个以壮族为主体、11个少数民族聚居的中国南疆省级自治区,也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五十多年来,广西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少数民族学生十几倍、上百倍地增加。1998年广西少数民族小学生约230万人,比1950年增加29倍;中学生约85万人,比1950年增加101倍;大学生约3万人,比1950年增加823倍。1998年,广西有独立设置的民族小学164所、民族中学64所、民族中专22所(其中民族师范学校10所)、民族师范专科学校5所、民族高等院校3





所。另外,从1980年起,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学院、广西医学院、广西中医学院、右江民族医学院、右江民族师范专科学校、河池师范专科学校均先后开办了少数民族预科班。

但是,广西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比较低,基础设施薄弱、科教落后、贫困面大等问题仍然突出,受到这些客观历史、自然条件的制约,广西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与发达地区依然存在差距,广西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教育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如办学条件还比较差,存在着校舍不足、危房多、教学设备缺乏等问题;中小学校布局结构不太合理,农村学校规模普遍比较小,小学教学点多且分散,办学的规模效益不高;初中辍学率偏高,“普九”达标及达标后的巩固工作难度比较大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对少数民族教育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我们编辑了这套“广西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研究”丛书,该书由广西边远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研究、广西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研究、广西希望工程评估研究、西南边境民族教育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研究、广西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投资心理研究等一系列科研项目研究和实践的总结成果组成。我们设想通过这种专题性的实证研究,力求多方位、多层次地总结和探寻项目工作经验,研究并提出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2

优先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提高民族人口的整体素质,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途径,也是民族经济振兴的内因。只有民族地区人才优势的巨大发挥,民族地区才有能力参与竞争,才能同市场经济接轨,才能真正体现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少数民族地区教育问题的研究仍然任重道远,“广西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研究”丛书只是走了第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深入研究,希望有更多的人关心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并为推进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而共同努力。

注重实践是该丛书最大的特色,全书均是在深入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完成的,是基于实践和理论的总结,但是全书毕竟是由五本独立成书的著作组成的,因此各书在取材范围、研究视角和个别观点的理解上,难免会有不同的风格和处理方式,作为学术著作,应该说是正常的。书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我们热切地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最后,我们还要对广西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感谢所有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支持和关注的领导和朋友。

编者

2004年2月于南宁

导 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它所表达的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时至今日,否认教育重要性的人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不会太多。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作为一项基础性事业,其发展绝非可以一蹴而就。教育的综合效益也要很长时间才能充分展现出来,对个人和家庭如此,对一个地区和国家尤其如此。

也许正是因为投资于教育的收益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回收,对于很多还在贫困线下摸索的农村家庭来说,解决每天的温饱问题才是真正的当务之急,孩子上学的事情就只好先搁下……也许出于同样的原因,或者还要加上基础教育所具有的突出外部性——某一地区在基础教育上的投资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是为大城市及发达地区的大学输送学生,这些学生大学毕业后回家所在县乃至省(如果该省比较落后的话)就业的可能性并不大,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往往没有兴办基础教育事业的真正动力和积极性;或者虽有动力和积极性,但由于财政紧张,需要资金的领域太多,基础教育发展所需的资金就只好先拖着……

所以,其重要性在年复一年地不断加以强调的基础教育实际上经常尴尬无比,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正因为如此,以资助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为宗旨的希望工程在1989年开始实施以后,很快在全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希望工程是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样一个非政府组织(NGO)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其主要目的在于动员海内外民间力量捐资扶持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这种公益项目的社会基础何在?各种社会力量为什么愿意资助希望工程?希望工程取得了哪些成效?希望工程对所在地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或将会产生哪些影响?这些正是本书所欲探讨的中心问题。

本书正文分为八章。第一章为理论部分。这一部分在剖析现代社会的分裂性与多元性的基础上,论述了希望工程的社会基础与社会意义,从而阐明了全书的理论视角并为其后各章的调查与实证分析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第





二章至第四章旨在对广西的小学教育进行简要的分析,阐明其中存在的一些关键问题,为理解广西希望工程的意义和影响奠定基础。其中,第二章主要依据文献资料描述了广西小学教育的总体状况;第三章以岑溪市四所农村小学的实地调查资料为依据,探讨了农村小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第四章以永福县一所小学为个案,就农村小学的师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第五至八章分别对广西桂林市(主要是龙胜县)、象州县、东兰县、天等县等地的希望工程进行了系统的评估。这些评估采用了大体相同的识别与阐明问题的框架,即将评估的问题分解为需求评估、项目理论与设计评估、项目过程与效率评估、影响评估等几种类型^①。需求评估旨在通过分析当地小学教育近几年的发展和变化(包括学校数量、师资、设施、学生等),探讨其落后或非均衡状况与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揭示实施希望工程的必要性。理论与设计评估旨在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出发,回答当地希望工程设计方案的科学性、现实性与可行性。过程与效率评估旨在通过分析资金募集、资金管理、失学儿童救助及希望小学建设及运转过程(选址、建筑工程、师资、学生、入学及管理等等),揭示希望工程运作过程与其理论设计的一致程度或背离程度,阐明希望工程运作过程的规范程度、科学性和有效性。影响评估旨在通过探讨希望工程与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地方经济乃至区域现代化的互动,论述实施希望工程的实际效果及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尽管第五至八章采用大体相同的评估概念及问题框架会带来一些问题(如结构单调,有些论述容易给人雷同之感),但这样做显然也有助于保证评估的规范性、系统性与科学性。特别是在多人合作的评估研究中,共享的评估概念与问题框架是保证评估标准的一致性及研究结论可比性的重要条件。

自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即大步踏上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谓“合理化”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工具理性”不断扩张,社会分工日益细密,价值与事实、理想与现实常常脱节和相互分离,两极分化、生态恶化、人性异化、社会失序等问题大量浮现,展现在人类面前的似乎注定是一片布满阴霾、令人悲观和忧郁的天空。

然而,人类毕竟是能思想、有感情的存在,人类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关怀在不断地引导人们超越现实的无奈和缺憾,使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总能孕育出自我修复与完善的内在机制,从而弥合现实与理想之间的一个个裂痕,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也许,从希望工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希望……

^① [美]罗西(Rossi, Peter H.)等著:《项目评估:方法与技术》,邱泽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46~55页。

目 录

前 言	(1)
导 言	(1)
第一章 公益教育项目的社会基础与社会意义	(1)
一、现代社会的分裂性与多元性	(1)
二、希望工程的社会基础	(7)
三、希望工程的社会意义	(21)
四、小结与思考	(32)
第二章 广西小学教育的现状	(35)
一、广西小学教育发展的现状	(35)
二、小学教育观念剖析	(38)
三、师资队伍的高素质与发展	(39)
四、素质教育实施状况	(41)
五、教育投资与教学条件	(43)
六、民办小学教育状况	(45)
第三章 广西农村小学教育剖析——以岑溪市四所农村小学为例	(48)
一、岑溪市四所农村小学的概况	(48)
二、农村小学存在的问题	(52)
三、农村小学教育发展问题的原因分析	(56)
四、农村小学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59)
第四章 广西农村小学的师资问题——永福县良村小学的个案研究	(65)
一、调查背景	(65)
二、基本状况	(65)
三、结果与讨论	(71)





第五章 桂林市希望工程评估研究——以龙胜县为中心的考察	(77)
一、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77)
二、桂林市希望工程的社会需求	(78)
三、桂林市希望工程的社会支撑	(83)
四、桂林市希望工程的运作过程	(85)
五、桂林市希望工程的社会影响	(89)
六、结语	(93)
第六章 象州县希望工程评估研究	(96)
一、评估问题的提出	(96)
二、象州县希望工程的具体目标及其实现状况	(98)
三、象州县希望工程的实施质量评估	(100)
四、象州县希望工程的社会影响	(102)
五、结论与建议	(110)
第七章 东兰县希望工程评估研究	(113)
一、东兰县教育概况及其制约因素分析	(114)
二、东兰县实施希望工程的可行性评估	(118)
三、东兰县希望工程实地调查结果及其分析	(120)
四、东兰县希望工程的社会影响	(126)
五、结语	(131)
第八章 天等县希望工程评估研究	(133)
一、天等县希望工程的必要性分析	(133)
二、天等县希望工程的可行性分析	(136)
三、天等县希望工程的运作过程分析	(139)
四、天等县希望工程的社会影响分析	(142)
五、结语	(148)
主要参考文献	(149)
后 记	(153)

第一章

公益教育项目的社会基础与社会意义

一、现代社会的分裂性与多元性

(一)现代社会分裂性与多元性的根源

在社会结构分析中,马克斯·韦伯曾区分了两种合理性:一种是涉及事实、强调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的“工具理性”;另一种是涉及价值、目的、意义的“价值理性”。正如韦伯所指出的,“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而这种“理性化”,更确切地说,是社会生活的“目的理性化”或“形式理性化”,就是“期待通过和利用外界事物与其他人的举止,将它们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①这样一种行为品质。而这种“理性”,以可计算性为自身的存在前提,其定量分析的方法,“导致根据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从而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分割开来”^②。更糟糕的是,近代科学的数值化、定量化、规范化、精确化,不仅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而且是作为一种理性精神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具有普遍性,是一种被人们广泛接受的理性的社会模式^③。所以,无论是在社会组织、结构与制度层面,还是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层面,都是按照这种理性原则建构起来的。然而,这种理性的发展膨胀使得工具理性征服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出现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进而步入了形式化和工具化的歧路。韦伯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类方法解释了现代社会,并且指出“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遮蔽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弊端之一。韦伯的这种分析方法也逐渐成为一种通行的基本范式,是理解现代社会分裂性与多元性根源的重要视角。

近代以后,中国也逐步踏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以“工具理性”的扩张为基本特征的合理化进程向前推进。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实施以经

①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6页。

②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③ 张康之:《公共行政:超越工具理性》,《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3页。





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现代化步伐大大加快,在经济迅速繁荣和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化”也在中国社会扩张。比如,在经济活动方面,建立“股份制”使企业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企业的生死存亡,从根据国家计划到根据企业的资本赢利状况来决定;企业的决策,从国家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到让企业根据市场行情自行决策;对生产成本和劳动成果的测量和计算,从宏观计划到价格机制;货物的价格,从政府统一定价到市场定价;企业领导人和劳动者任用,从任命分配到市场招聘,并取消劳动就业方面的终身聘用制等等。在政治体制方面,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建立更加专门化的行政管理体制;调整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尽力精简机构和人员,合并职能相近的机构;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等等。所有这些改革措施在提高活动效率的同时,也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工具理性化”。

由于“工具理性”着重于手段对达成目的的可能性。正如伯特兰·罗素表述的那样:“(工具)‘理性’有一种极为清楚和准确的含义。它代表着选择正确的手段以实现你意欲达到的目的,它与目的选择无关,不管这种目的是什么。”^①而“价值理性”,“则是人类对价值和价值追求的一种自觉意识,是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对价值追求的自觉理解和把握。价值理性在人的活动中表现为价值主体合规律性与和目的性相统一的行为取向”^②或“指的是用来寻找价值的根据或给价值提供基础的理性”^③。这就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矛盾与冲突的紧张关系。审视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虽然都是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指导下进行的,但是实践上却出现“工具理性”的片面扩张,往往是“效率”得到重视,而“公平”却受到挤压,出现了社会资源分配不合理、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等不合理的因素,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裂痕加大,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分裂及这种分裂性的再生产,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多元化及内在冲突的凸现,社会管理的复杂性和难度增大。

-
- ① 伯特兰·罗素:《伦理学与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 ② 张兴国:《“价值理性”哲学应用的方法论选择》,《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1页。
- ③ 翟振明:《价值理性的恢复》,《哲学研究》2002年第5期,第17页。

(二)现代社会分裂性与多元性的表现

1. 社会结构的分裂及其再生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作战略重点,中国社会也进入快速转型时期:由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由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化^①,经济社会结构中供求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正经历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社会资源的配置呈现出从扩散向重新积聚转化的趋势。具体来说,中国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范围包括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从国家调配转向市场交换;社会资源占有关系从集中、一元转向分散、多元;社会分配关系从直接、单一转向间接、多样;社会功能结构从高度综合、同质性转向高度分化、异质性;社会阶层结构由封闭、等级身份到开放、平等契约;社会政治与公共生活从集权、理论型到分权、法理型;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由大一统、愚昧到多样化、文明;对外关系由封闭、脱轨到开放、接轨^②。

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将中国带入一个多元复合的社会转型期,社会资源配置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社会阶级结构、社会群体与社会利益格局急剧分化。主要表现为不同类型组织的分化,同一类型组织的等级化、层次化,不同社会阶层、群体间的分化等。于是,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并稳定了几十年的社会阶层身份制逐渐解体,森严的居民身份壁垒逐渐被打破,原来简单化的“干部、工人、农民”的三元格局慢慢地被多元化、多向度、复合制、互易性的身份存续状态所冲击甚至取代。社会结构正处在由“金字塔型”向“橄榄球型”过渡的阶段^③。从群体分层结构看,主要是农民分化,工人群体膨胀,个体私营阶层的出现,社会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收入差距开始拉大。比如不同群体的经济收入产生差距,随着改革的深入,收入的差距和财富拥有的不平衡,社会结构逐渐形成一种两极化形态。在这两极化的社会结构中,一极是拥有大量财富的占少数人口的社会强势群体,另一极是处于贫困的人口众多的社会弱势群体。从中国社会结构目前状态看,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最典型,也是最突出的问题。自改革以来,国家政策给农村人口提供了一个较为自由的活动空间,农村人群纷纷拥入城市谋生。在这

- ① 陆学艺、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转引自刘继同:《由静态管理到动态管理:中国社会管理模式战略转变》,载《管理世界》(月刊)2002年第10期,第26页。
- ② 陈烽:《中国当代社会的八大转型》,《社会科学》1993年第8期。转引自刘继同:《由静态管理到动态管理:中国社会管理模式战略转变》,载《管理世界》(月刊)2002年第10期,第26页。
- ③ 关晓丽:《中国社会结构正由“金字塔型”向“橄榄球型”过渡》,《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第231页。





样一种状态下,城乡二元结构似乎会消失。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城乡发展差距反而越拉越大。在城市里,农村人群并不享有与城市人群同等的机会,他们的就业、子女上学、权益保障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之外,还要受社会资本的限制。这样,中国社会不但仍然存在显性的城乡二元结构,而且还存在一种潜在的城市二元结构:由城市人群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和在城市里务工的农村人群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的分离。

改革不仅是利益的调整,而且也是社会结构的重构^①。中国社会转型是整体、综合和系统性的结构性社会变迁,其实质是覆盖政治制度、经济生产、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领域的全面社会变革与社会大转变。社会结构转型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另一只看不见的手”^②。在社会转型时期,对个人而言,重新定位是每个人都必然面临的问题,而且这种重新定位与改革开放前是根本不同的,因为今天的这种重新定位是与个人的努力直接相连的。在改革开放前,社会资源主要由国家来配置,个人的努力受到僵化体制的约束与限制。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市场已经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对社会资源的获取是与个人的努力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激发了社会各个阶层希望通过个人努力获取社会资源的一种由个人重新定位造成的竞争精神,而这种精神是社会结构再生产不可缺少的动力。对政府而言,要采取一些深层次的政策和措施,从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加速城市化进程,以及理顺分配关系等方面入手,引导中国社会结构向“橄榄球型”结构演进,改变目前中国社会结构所处的状况,实现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结构向现代化方向发展,为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

2. 社会心理与价值观的多元化。

在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方面,人们可获得的社会资源日益丰富和多元化,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低层次心理需求得到了相对普遍的满足;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动以及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异向变动,社会心理已变得日益纷繁复杂、难以捉摸,并表现出不同社会阶层的特性及其自身的模糊性与不稳定性,相当一部分人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心理平衡危机。具体表现为^③:

其一,相对剥夺心理。相对剥夺感这个概念,首先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

① 孙立平:《社会结构转型与个人的社会定位》,《光明日报》1998-04-03。

② 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转引自刘继同:《由静态管理到动态管理:中国社会管理模式战略转变》,载《管理世界》(月刊)2002年第10期,第26页。

③ 张宇:《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心理失调与调适》,《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63页。

弗等人提出,后经默顿在其《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发展成为一种关于参考群体的行为理论。今天,由于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许多东西都不规范或者来不及规范,导致一部分人利用法律、政策和管理的漏洞而暴富,而一部分人埋头苦干、合法经营却收入微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结构迅速分化,许多公众抱怨个人的经济地位与自己对社会的贡献相比是偏低的,而且两者相称的比例在连年下降;多数公众认为与周围的人相比,自己的经济地位偏低^①。更有甚者,许多群体和个人已经或者正在逐步被社会边缘化。相对剥夺感是任何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只是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已。

其二,不平衡心理。由于打破平均主义而导致利益分配上的不均等,社会各阶层获益上的差距经过社会比较,一方面,人们主观上感受到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社会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的普遍存在,加之自我偏爱的心理定势以及盲目攀比、怀旧失落等心理影响,使人们在进行社会比较时又都感到自己得益最少。尤其是原先享有较高政治地位的社会阶层,如产业工人,随着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甚至面临下岗失业的危机,原有的政治上的荣誉感与优越感在逐渐失落;今天在人们心目中仍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一些社会阶层,如知识分子,其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也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这种现实处境,使不少公众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失衡。

其三,短期行为心理。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社会结构的分化,社会阶层在迅速地变动,人们既茫然于自己在新的社会格局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又茫然于如何在新的社会格局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唯恐被时代所抛弃的焦虑感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心灵。人们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干什么,适合干什么,或者患得患失,犹豫不定;或者急匆匆地选择经商、出国、下海,在“经商热”、“出国热”、“下海热”等一轮轮的冲击波中摸爬滚打。人们在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时,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恐惧,往往会选择短期化行为,只顾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得失,而不再去考虑长期投资与收益。

其四,冷漠无助心理。由于社会竞争压力大、自我价值实现的愿望迫切,社会心理与社会人际关系出现功利化、冷漠化趋势,只要不涉及自身利害关系的,且不说对社会问题即便是自己身边的人与事,都是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观望和听之任之的态度。这种冷漠心态,从表面上看是人们的价值观念转变过程中发生的心态扭曲,但从更深层次看,这种冷漠的背后深刻地反映出当前公众心态中普遍存在的无助感与受挫感,即对周围事物施加影响的无力感与无效感。这种无助感与受挫感,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宣泄和疏导,极有

^① 揭扬:《转型期的社会心态问题及其有效疏导》,《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7年第5期,53~57页。





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矛盾聚焦点,并演化出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引发着社会心理的重大变革,形成了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价值观。为了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积极倡导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许多新的价值观念,如自主、自强、自立的价值观念,以及竞争观念、风险观念、效益观念、公平观念等已经被许多人所接纳。然而,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过程,而且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也不可能步调一致,加上这些年的对外开放,人们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这使我们学到了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也使西方社会的腐朽思想和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等思想,导致中国的社会价值取向进一步多元化。这就使社会价值观念出现分化,导致社会价值体系呈现多样化的格局。社会价值体系的多样化,必然导致人们的价值追求出现多元化取向。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心理和价值变化的主要趋势与特征表现为:在价值取向上,从注重理想向强调实际的方向发展,从注重义务向强调利益的方向演变,从注重集体向强调个体的方向转化;在社会心态上,从封闭化、情感化、单一化走向开放化、理性化、多样化^①。

3. 社会管理的复杂性与困境。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每一个人都被确定在一个组织(单位)内,每个人的言行都可以由组织(单位)来控制,而且这种控制是自上而下的,加上那时NGO数量少和影响力低,甚至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因此,任何事态的出现和发展基本上都可以被政府绝对地掌握和控制。

改革开放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变迁,集中反映在中国社会总体性结构转型,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国家与组织(单位)关系由总体生存模式向独立生存模式转变^②,个人与国家(单位)关系由依附性向独立性转变。总体来说,中国社会关系由简单化、两极化向复杂化、多极化转变,社会结构由同质化、静态化向异质化、动态化转变趋势明显,全国范围由大一统格局向多元化格局、工作单位由雷同化状况向差异性状况转变^③。这意味着社

① 沈杰:《中国社会心理嬗变:1992~2002》,《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134页。

② 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转引自刘继同:《由静态管理到动态管理: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的战略转变》,载《管理世界》2002年第10期,第33页。

③ 刘继同:《由静态管理到动态管理: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的战略转变》,载《管理世界》2002年第10期,第34页。



会管理的复杂化,一方面,政府过去所形成的千篇一律的统一管理模式,不能对社会出现的问题作出较快的反应,已不能有效地管理千变万化和千差万别的社会、组织与个人;另一方面,在社会体制变革时期,维系社会平衡的条件和环境最易发生变化,而且变化越大社会管理越复杂,其表现形式就是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且涉及范围广、人员众多,而政府对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又难以在短期内加以较好地解决,这就使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呈下降趋势。所以,在转型期的社会运动本身的离心倾向,使弱势群体的存在和延伸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尽管社会开始出现众多的也担负了一些社会管理职能的NGO,但这些组织由于缺乏沟通和制度保证,还不是一种十分有效地与政府一道共同协调来解决出现的社会问题或社会危机的机制和途径。

在这样复杂化的社会管理状况下,怎样在复杂化、多极化中发现普遍性规律,如何有效地管理千变万化和千差万别的社会、组织与个人,如何缓和效率与公平的冲突,如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普遍管理与特殊管理有机结合起来,这些都是社会关系复杂化与社会结构异质化给社会管理者提出的新议题、新挑战。随着社会主体独立意识的日益增强,以及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权力结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而权力结构多元化必然导致国家权力分散化,国家的社会福利责任与义务也随之分散化。社会福利社会化政策的演变与发展便是典型例证^①。这就给政府和人民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在以效率为目的的“工具理性”和以公平为目的的“价值理性”这两种本质上不同的“理性”准则之间进行平衡?对这个难题企图加以解决的种种尝试,将政府和人民真正引向了韦伯指出的那种历史性困境,即对这两种“理性”准则既要兼顾又难以兼顾的困境。正是这种历史性的困境,导致了不同程度上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这种由现代社会的分裂性与多元化引发的历史性困境,也正是本书对公益教育项目——希望工程进行评估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视角。

二、希望工程的社会基础

(一)希望工程的社会需求

1. 从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看。

贫困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基础教育有效实施的难题。多年来,对于

^① 莫邦豪、刘继同:《中国特色:经济市场化与福利社会化》,《香港社会工作杂志》,Vol.32.2:pp.33~

51。转引自刘继同:《由静态管理到动态管理: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的战略转变》,载《管理世界》(月刊)2002年第10期,第34页。



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各级政府在政策上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予以极大的重视,也投入了不少的资金和物质,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也在资金和物质等方面予以救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地区儿童的入学问题。然而,一方面,由于贫困面太广、数量太大,政府的投入、社会的救助只能是杯水车薪,入学、升学的经济压力仍是贫困地区儿童获取更多教育机会的障碍,许多儿童正在失学,正在上学的也依然随时面临着失学的威胁。另一方面,尽管政府的投入、社会的救助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教育环境,缓解贫困孩子的入学压力,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从我们的调查中看到,由于大部分贫困地区处于“老、少、边、山、穷”地区,交通闭塞,家庭以农业、手工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经济收入主要源于农业生产,经济状况绝大部分处于贫困线以下,不少家长靠在农闲时到外地打工维持生计。由于贫困问题非一日之寒,解决它亦非一蹴而就,许多家庭仍在被贫困问题所困扰,学费仍是许多家庭的一项重要经济压力,一部分农村家庭因无力承担学费而让孩子辍学。同时,社会发展与知识经济对知识的需求和要求的增加,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所在地区、所在家庭的贫困度,由此陷入了贫困—失学—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

对于希望工程,人民群众了解的程度参差不齐,但对子女们所在的学校,家长们都予以了高度的赞赏和感激,认为这“是让人钦佩的公益行为”,从而也提高了他们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同时我们也了解到,虽然生活贫困,但是大多数家长对孩子受教育还是很关心的,也是充满热忱的。许多家长都表示只要孩子能读得下去,无论多苦,还是会想尽一切办法支持孩子读书,直到大学毕业,因为他们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迫切希望孩子们不要再重蹈覆辙。据调查,所有的家长对希望工程都予以厚望。对于贫困家庭来讲,失去希望工程的资助就意味着让孩子辍学,那样,失学儿童的比例就会增大,文盲率也会相应地提高,那么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速度和脱贫致富机率就会大大降低。这是他们及孩子所不愿发生和不能接受的。

2. 从当地社会心理及传统习惯看。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来的传统思想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均贫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主义理想又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平均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在改革开放至今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分化,“富人阶层”的奢靡与“贫困阶层”的潦倒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贫富差距的拉大让很多人一时难以接受,在心理不平衡之余难免产生“仇富”心态。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事实,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于是,人们在逐渐接受现实的过程

中,对富人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值很高,希望他们能拿出更多的钱来反哺社会。

从当地社会对教育的文化认同看,人们普遍认为,受过教育和没受过教育就是不一样,文化程度高的人,接受新思想快,学东西也快,而且“听话”、“懂事”。也有人认为,家里出个大学生很光荣,是光宗耀祖的事。还有人认为,培养有出息的儿女是为了年老的时候能过上好日子。农村学生则大多是希望通过考上大学跳出“农门”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毋庸讳言,在当前农村思想文化中还存在着一些陈腐落后的思想观念和传统习惯,如男尊女卑、封建迷信、宗族观念、唯利是图、自私狭隘等。在边远山区,许多农民仍然存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他们认为,女孩子要嫁人迟早都是“泼出去的水”,是“别人家的人”,在娘家花钱读书太划不来了。有的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只要认得几个字就够了,要那么多文化干嘛?一些孩子多、经济状况不太好的家庭,家长总是舍车保帅,让男孩读书而让女孩务农或打工。因此许多女孩被迫辍学做家务或外出打工,导致失学儿童(尤其是失学女童)增多。在失学儿童的救助方面,希望工程可以有所作为。

扶贫济困、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意理到实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这是一种潜在的慈善资源。慈善事业的意义就在于将这种潜在的资源变为现实的救助行为。这是希望工程在传统与现实的契合点,也是希望工程继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源泉。

3. 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看。

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来,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由于自然、历史等多种条件的差异,区域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落后,教育经费严重短缺,办学条件差,大批危房、校舍亟待改建,目前,全国中小学尚有1400多万平方米的危房,主要集中在农村贫困地区。教育经费主要是财政拨款,经费不足,而且往往不能到位,导致学杂费及学校各类收费逐年上涨,而农民收入低、增长放缓,缺乏推动和支持农村教育持续发展的能力(见下表),这就加大了学生家长的负担,许多边远贫困地区孩子无校可上或无钱上学而失学或面临失学,造成儿童失学率的相应增长。

表1-1 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消费支出与可供交学费的钱

年份	农民人均 纯收入	人 均 消费支出	收 入 与支出差	平均每户 常住人口	收入差 常住人口
1995	1578	1310	268	4.48	1201





续表

年份	农民人均 纯收入	人 均 消费支出	收 入 与支出差	平均每户 常住人口	收入差 常住人口
1996	1926	1572	354	4.42	1565
1997	2090	1617	473	4.35	2058
1998	2162	1590	572	4.32	2460
1999	2210	1577	633	4.25	2690
2000	2253	1670	583	4.20	2449
2001	2366	1741	625	4.15	2594
2002	2476	1834	641	4.13	2647

数据来源:中国历年统计年鉴。

在正常情况下,农民用来交学费的钱是在满足了基本的消费支出以后剩余的部分,即表1-1中收入差常住人口中的一部分。然而,根据《2003年统计年鉴》“农村居民按纯收入分组的户数占调查的比重”的数据分析可知:农民年纯收入在1500元以下供一个初中生都是有困难的,就是说现在中国将近30%的农民供不起一个子女读初中,17%的农民只能供一个子女读初中,大概只有15%的农民供得起一个子女读高中,能够负担得起一个子女读大学的农民更是凤毛麟角^①。另外一种情况是,有的农民就算有钱但考虑到子女读书的机会成本太高、投资的周期太长,未来不可预测,而宁愿把它花在建房子和享受消费上面,也不愿意进行教育投资。这就是在国家法律法规的严格监督 and 政策的三令五申下,农村中小学辍学的学生还是有增无减、农村学生升高中和升大学的比例越来越低、城乡的教育水平差距越拉越大的根本原因。

教育改革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但贫困地区的财政困难加大了师资、教室、设备、经费不足的矛盾,与贫困地区农村实际需要存在极大的差距。由于经费不足造成教职工工资拖欠严重,给教职工(尤其是民办教师)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严重挫伤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而教学质量不高又加深了学生的厌学情绪;看不到希望,学生不想上学而家长也不愿意继续供孩子读书,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实施希望工程,可以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世界各国的教育经费均来源于政府预算支出和民间投资两方面。而四十多年来,中国教育经费基本上

^① 李小芳:《从机会成本来探讨农村教育落后的根源》,《湖南商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42页。